

【历史研究】

姚鼐《述庵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

朱曦林

摘要:姚鼐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桐城派三祖之一。《述庵文钞序》是姚鼐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的重要文献,但长期以来由于直接文献的阙如,对该《序》的撰写时间,学界尚存较大的分歧。通过对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释,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证,可以确定《述庵文钞序》应是作于嘉庆三年五月至八月八日之间。同时,透过王昶、姚鼐对《序》中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乾嘉之际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关键词:姚鼐;《述庵文钞序》;王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3-0138-07

在清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虽曾盛极一时,但与之颉颃者代有人出,其中姚鼐提出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①,不仅对考据学贬抑辞章进行了反驳,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桐城派理论,如姚莹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说^②,曾国藩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说^③,皆渊源于此。姚鼐为王昶撰写的《述庵文钞序》,是其系统阐释“三者兼收”说的重要文章。^④然而,由于该文的主旨未能惬王昶之意,在编订《文集》时被其刊落,姚鼐对此颇为不满,曾认为:“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不录邪?”^⑤在既往的研究中,《述庵文钞序》时常被征引以阐明姚鼐的学术主张,但由于相关文献的阙如,对该序的写作时间多为推测,或系于乾隆六十年(1795),或系于嘉庆三(1798)、四年,尚未有直接的史料加以佐证,故迄今为止仍存悬疑。^⑥笔者在搜集爬梳姚鼐文献的过程中,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一通,该札明确谈及其本人为王昶《述庵文钞》作序一事,且札内月日署具清楚,有助于厘清该序文究竟作于何时的问题。^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通书札的内容进行释证,同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对《述庵文钞序》的写作时间重新作一考辨,并以此为切入点探

讨该《序》被王昶刊落的原因,以期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见姚鼐致王昶手札释证

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幼承家学,受经学于伯父姚范,复学文于刘大櫆,诗文俱佳,尤工于古文。中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庶吉士,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刑部广东司郎中。“四库”开馆,以部郎入局修书,未几请归。先后主扬州梅花、江宁钟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等书院讲席者四十年,弟子遍布南北,被尊为“桐城三祖”之一。王昶(1725—1806年),字德甫,号述庵。乾隆十九年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晚年休致,历主娄东敷文书院、诂经精舍讲席。学承惠栋,潜心经术,讲求声音训诂,诗追三唐,文宗韩柳,提倡风雅,与朱筠并称“南王北朱”,俨然一时盟主。王昶与姚范、姚鼐伯侄结识于京师,论学宴游,多有往来,尤与姚鼐熟稔,尝于著作中称述其古文“淳古简净,纾徐往复,亦多不尽之味”^⑧,而姚鼐对于王昶亦多有推扬,认为他是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皆具之才”^⑨。现谨将姚鼐致王昶书札录如下:

收稿日期:2021-09-2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儒学案》与民国初年学术研究”(19CZS046)。

作者简介:朱曦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八月八日,姚鼐顿首奉书述庵先生阁下: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如亲接待。生平于先生古文,但于石刻中略见数首,知具才识闳深,而体裁明正而已。今乃得尽览大集,然后见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传于后世无疑也。就鼐所见,缀为一序,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否?《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悚耶?尚欲留观,而承命取回,以为校本,想校定后,必合尊诗同见惠也。读《跋〈楞严〉后》一篇,弥增两世交亲之感。家伯著述竟未能编刻,鼐《经说》中存数条而已,今并鼐《诗集》一部,同呈大教。若夫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此非鼐一人所当敬诵服膺,凡海内士流,其孰敢不承听乎!见惠《董帖》、瓦研、笔墨,俱祇领,谨申谢。鼐尚行适苏州,或竟得造淞江瞻谒,亦未可知,但不能自必耳。秋凉益深,伏愿为天下珍重,不宣。姚鼐顿首。^⑩

此通书札,涉及姚鼐对王昶《文集》的阅读及序文的写作,大要有三:其一,姚鼐对王昶古文成就的了解,早年仅从“石刻中”略见其概,直至此时阅读到王昶的文集,方领略到“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传于后世无疑也”。其二,姚鼐得以获读王昶的《文集》,乃王氏之子将该书携至江宁,姚鼐因于《集》中所见,深有所感,遂“缀为一序”,自信能阐发其《集》中之“佳处”。但王昶旋即以作校本为辞,将之取回,姚鼐“尚欲留观”而不可得。其三,姚鼐因意有未尽,遂追作此札,强调王昶与其伯父姚范“两世交亲”,并趁此机会将其所著《九经说》及《诗集》一并呈上,阐明“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的治学旨趣,希望能得到当时汉学代表人物王昶的肯定^⑪。另外,在此札中,姚鼐还表达了欲往拜谒王昶之情。

那么,此时姚鼐所读到王昶的“大集”,是否即为《述庵文钞》?结合姚鼐的《述庵文钞序》,可作进一步梳理。

首先,姚鼐札中提及,“生平于先生古文,但于石刻中略见数首,知其才识闳深,而体裁明正而已。今乃得尽览大集,然后见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传于后世无疑也”,则王昶此一“大集”,不仅古文佳作尽见其中,且此前未曾结集出版。而姚鼐在《文钞序》末段则云:“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并强调,“若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

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可见《文钞》之编订乃是王昶晚年休致归里后方才着手,尤以所择古文为精要,正符合札中所言。

其次,姚札中云“就鼐所见,缀为一序”,“承命取回,以为校本,想校定后,必合尊诗同见惠也”,则进一步明确姚鼐所作者当是文集之《序》,乃有“合尊诗同见惠”之说,且其云“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否”则几与《文钞序》“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如出一辙。

最后,姚鼐札中云“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而《文钞序》以“见寄于金陵”为言,则姚鼐获读赠书时均在江宁,只是书札中所言较《文钞序》为加详。另外,姚札中提及的“读《跋〈楞严〉后》一篇”,考之王昶《文集》,其跋文《再书〈楞严经〉后》开篇即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莘、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于宗教之流别,性相之权实,盖茫如也。”又说:“南青先生自辛巳别于京师,不相见者十年,昨知其嗣君以忧去官,则先生已逝也。先生为天津山长,数与余书论《佛顶蒙钞》及《成唯识论》,往复数百言不已。”^⑫王昶在跋文中对姚范佛学造诣的推许及往复论学情谊的追忆,方能使姚鼐产生“弥增两世交亲之感”,又惜乎其伯父著述未能编刻的感慨。

此外,姚鼐在札中云:“《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悚耶。”可见此《序》对他来说,必然是精心结撰之作,故自信定能为王昶采用,使《序》随《集》传。考察姚鼐与王昶的交往及其相关论著,唯有至晚年还多次提及的“吾昔为作序寄之”^⑬的《述庵文钞序》,可承姚鼐这一系念。故综上所述所考,姚札中所提及的《序》,当是《述庵文钞序》。

二、《述庵文钞序》撰写时间考

《述庵文钞序》究竟作于何时?欲解答这一疑问,有必要先厘清王昶《述庵文钞》的编纂时间。对此,姚鼐在所撰《序》的最后一段,已提供了一些线索,其言曰:

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独贵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发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

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⑭

据此,则《述庵文钞》的成书,当是在王昶请辞归里之后。复据王昶女婿严荣所编《述庵先生年谱》,其请辞虽在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但因清高宗以“岁暮苦寒,宜俟明岁春融回籍”挽留,至五十九年四月方才启行,抵里已到了七月,随即以“春融”颜其堂,读书其中。九月时,王昶又因病“卧榻者月余”。^⑮那么其着手编订是集,应在是年十月以后。

嘉庆元年正月,赵怀玉为王昶《述庵文钞》所撰的序文中提到:“盖数十寒暑于兹,顷始定其所为《述庵文钞》二十卷见示。”可见大体至此时,《文钞》的整理初毕,并且赵氏还引用王昶的原话:“昔人有言:‘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传之与否,殆有命。存予文多为人代草,亦有出自他手而传予名者,今皆不敢阑入,先后掇拾如是而已。”^⑯强调了王昶此集并非泛滥无章的初稿,而是业经取舍的初定本。需要指出的是,赵氏此序在收入《春融堂集》时,“顷定其所为《述庵文钞》二十卷见示”已被改为“门下士定其所为《春融堂文集》四十卷”,并删去了赵氏征引王昶的原话。同时,前引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的表述也提示我们,在嘉庆元年赵怀玉作序之后,王昶对《述庵文钞》或是重新编排,或是增补,使得《文钞》从原来的二十卷编订为四十卷,到最终刊刻时已由《述庵文钞》改称《春融堂文集》。由于迟至嘉庆七年时,王昶因目疾,诗文两《集》“尚待编排校勘”^⑰,迄于其逝世后的翌年(嘉庆十二年)始有刻本行世^⑱,而赵氏在王昶生前又曾“时时过访”^⑲,这一修改具体出自何人之手,已难以知悉。但这种对旧《序》的修订、删改,主要是为了反映后来卷帙的编排重订情况,以符合定本卷帙的概貌。因此,大体至姚鼐作《述庵文钞序》时,四十卷本的《文钞》编订已基本蒞事。

而据前文的考证,姚鼐在致王昶书札中提到“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并用了较长的篇幅推扬王昶的古文成就,转而交代,“就鼐所见,缀为一序”,那么此札所指的《序》,很显然为《文钞》而作,与《述庵文钞序》所说“见寄于金陵”而撰成序文,当是指同一事。值得注意的是,札中在述及作序一事时,还提到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家伯著述

竟未能编刻,鼐《经说》中存数条而已,今并鼐《诗集》一部,同呈大教”;其二是“鼐尚行适苏州,或竟约造淞江瞻谒,亦未可知,但不能自必耳”。

先说第一个问题,姚鼐的《九经说》侵版于嘉庆元年八月,刻成于翌年五月;^⑳《诗集》则刊刻于嘉庆二年九月,他在致陈用光的书札中曾提及:“鼐顷自定《诗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诗集》现付刻,计明秋可以成工;《文集》俟再办耳。”^㉑最终《诗集》在嘉庆三年四月刻成^㉒。而姚鼐的《文集》,则迟至嘉庆五年冬,他在江宁钟山书院的弟子才“合为镌刻”,嘉庆六年春方蒞事出版。^㉓由此也可解释,以古文名世的姚鼐当王昶以《文钞》见示时却仅呈送《九经说》和《诗集》,而未及《文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姚鼐致王昶的书札当是作于嘉庆三年四月以后,但要早于嘉庆五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姚鼐是何时“行适苏州”,再拟至淞江瞻谒王昶呢?据姚鼐依年编次的《惜抱轩诗集》及郑福照所编《姚惜抱先生年谱》,自王昶休致迄于病逝,期间姚鼐仅在嘉庆三年“携长子持衡游吴中”^㉔,他在嘉庆三年十月十三日致陈用光的书札中也提及,“鼐于八月半后,携衡儿游吴中,遂至西湖”,“作古今体诗四十余首,拟明年以补入《集》中,其间颇有奇作也。九月杪回江宁,近状平安”。^㉕其《诗集》中亦有《苏州新作唐杜公白公宋苏公祠于虎丘嘉庆戊午八月鼐及陈方伯诸公游宴祠内作四绝句》《戊午八月廿六日过苏州忽忽一诣虎丘后二十五日自杭州回与马雨耕及持衡重往竟日登揽因题八韵》两诗为证,则是年姚鼐应友朋之邀游历苏杭当在八月中旬至九月杪之间。^㉖而据《述庵先生年谱》,由于是年九月王昶应江宁将军庆霖之邀出游金陵,旅寓扬州,^㉗故而姚鼐虽游历苏州、杭州、无锡等地,但未至淞江瞻谒,最终亦未能与王昶晤面。事后,姚鼐曾感慨道:“鼐在苏州独值莘楣旋里,不得见;而鼐去江宁时,王兰泉适又来此。”认为,“此却是今秋可恨事耳”。^㉘

另外需要指出,由于姚鼐未能留观该书,不存在此后另撰序文的可能,该序文实乃同其《文钞》书稿一同寄还王昶。所以,姚鼐写作《述庵文钞序》的时间,应当在嘉庆三年五月以后,嘉庆三年八月或稍前,但至迟不会晚于“嘉庆三年八月八日”。

三、考据、辞章之辨与姚撰《述庵文钞序》的刊落

王昶自乾隆十九年入都会试,初识姚鼐,此后二

人论学谈诗,时有过从。王昶学宗汉儒,奖掖后进,提倡风雅;姚鼐学继方、刘,以古文辞章,教被东南,二人于乾嘉之际俨然汉、宋宗主。是时,恰逢袁枚与孙星衍关于辞章、考据之辨展开学术争论,袁枚认为“古文之道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为考据者“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极其所至,燎于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烬也”,并总结道:“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辨而明也。”^⑳孙星衍不能苟同其说,反对将辞章、考据分视为道、器,认为二者并非“经之所谓道与器也”,“古人重考据甚于重著作,又不分为二”,主张“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达之学”,提出“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㉑可见孙星衍之言即秉承自顾炎武、惠栋、戴震以来汉学中人所倡导的“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㉒。

这场论争随着孙星衍《问字堂集》的刊印及王鸣盛、钱大昕、江声、阮元、朱珪等汉学宗主的揄扬,遂使考据与辞章之辨成为一时学坛热点,学林中人对此各有持论。^㉓如焦循认为孙星衍《复袁太史》一书,力锄谬说,用彰圣学,功不在《孟子》下,主张“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强调“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贬抑单纯的辞章之学“于经仅有皮毛”,而袁枚更是“与经学绝不相蒙,止可为诗料、策料”。^㉔凌廷堪亦与孙星衍、焦循“力辟其谬”,唱为同调之鸣,认为:“文者,载道之器,非虚车之谓也。疏于往代载籍,其文必不能信今;昧于当时掌故,其文必不能传后。”^㉕批评为辞章者:“窃谓近者学术昌明,士咸以通经复古为事,本无遗议。而一二空疏者流,闻道已迟,向学无及,遂乃反唇集矢,谓工文章者不在读书,淪性灵者无须考证。此与卧翳桑而侈言屏膏粱,下蚕室而倡论废昏礼者何异。”^㉖而与汉学异趣的章学诚则对考据、辞章均有不满,不仅批评孙星衍“兼该甚广,未知尊旨所在”,对袁枚更是认为“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㉗并重申其宗旨:“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为之者道也(自注: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

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㉘也就是说:“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㉙

对于这场考据与辞章之辨,姚鼐虽未直接介入,但从其在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一书中就驳难考据学之处“动笔圈点”,并对戴震义理之学多有訾议,则可见其态度。^㉚事实上,面对考据学持久以来的压力^㉛,姚鼐在乾隆五十八年弟子鲁嗣光拜谒时,已曾阐发其“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不可缺一”之说^㉜,翌年他为谢启昆的诗集作序时又感慨道:“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㉝其言外之意仍在强调考据、辞章的“兼善”。嘉庆元年,姚鼐在复秦瀛来书时再次强调“必兼收之乃足为善”^㉞,随后的《复林仲骞书》又重申了此意。可见,姚鼐关于义理、文章、考据关系的论述,虽然“看似没有明涉袁枚与孙星衍等人之争,但他的述说是针对这场争论而来,则绝无可疑”^㉟。

其间,王昶在乾隆五十九年秋休致归里后,着手《述庵文钞》的编订,至嘉庆元年二十卷的初稿编成,复经修订,编为四十卷,在嘉庆三年由其子带至江宁向旧友姚鼐请益。姚鼐在阅过书稿后,即就所见撰为《述庵文钞序》,再次阐发其“三者兼收”说,自信于王昶之学能发潜幽微。不久,王昶以作校本为辞向姚鼐索回该书,姚氏虽欲留观而不可得,遂撰成书札,与序文一同寄呈王昶,一方面推扬其古文成就,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姚“两世交亲”,并趁此机会呈上所著《九经说》及《诗集》,阐明其“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的治学旨趣,希望能得到王昶的认同。其中《九经说》一书,即被其视为“发挥义理,辅以考证,而一行以古文本”^㊱的兼通之作。

由于《春融堂集》在王昶生前未能出版,姚鼐期盼的“必合尊诗同见惠”的希望并未能实现。姚鼐晚年在听闻王昶《文集》已刊行后,即嘱咐弟子姚椿为其寻购:“其《文集》当已刻。吾昔为作序寄之,然竟未得其刻本,幸觅一部见寄。”^㊲但当发现所作序文被刊落时,姚鼐对此颇有不满之意,一改致王昶书札中所表现出的“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否?《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悚”的自信态度,转而认为:“鼐昔作《述庵文序》,今其《集》中乃不载,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不录邪?抑其后人择取而遗之邪?此不可解也。”^㊳

以姚鼐在嘉庆年间的声望,若非得王昶本人的首肯,似难将其所作《序》文芟除。

然而,在刊落姚《序》的同时,属于汉学阵营,被江藩称为“好学深思,无书不读,肄经,深于诗,故兼工文章”^{④8}的赵怀玉,其所作《述庵文钞序》则被冠诸《春融堂集》卷首,对比姚鼐与赵怀玉两篇《序文》,可以看到二人立论主旨的差异。赵怀玉的序文说道:

今海内操觚之士,其趋不出二端:曰训故之学,曰词章之学。通训故者,以词章为空疏而不屑为;工词章者,又以训故为餽钉而不愿为。胶执己见,隐然若树敌焉。夫董生、杨子奥于文,于经未尝不深。匡鼎、刘向邃于经,于文未尝不茂。彼好为异同,交相訾议,必其中有所歉浅之乎?窥古人而意犹未尽融也。若去二者之弊,又克兼二者之长,则世颇难其人,而人且宜以为法,吾于侍郎述庵先生见之焉。^{④9}

虽然赵怀玉的序文也表彰王昶“真能合训故、词章为一,而非偏于习尚、泥古而未融者可相提并论也”,但侧重点在于最后一段凸显王昶“治经淹贯众说”,并能以词章助考证的一面。而姚鼐的序文则言:

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

姚鼐之《序》在揄扬王昶“三者皆具之才”^{⑤0}的同时,亦如此前所说“须兼三者之用,然后为之至”^{⑤1},最终所要强调的仍在于“三者兼收”之说。

从赵怀玉、姚鼐两《序》所反映的主旨来看,王昶对二者的存别,不仅代表了他对这场考据、辞章之

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考据学极盛的乾嘉之际,汉学中人与“以程朱为宗”的姚鼐对待“三者兼收”之说的不同看法。^{⑤2}

首先,在对待义理的态度上,姚鼐认为:“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⑤3}批评为考据者:“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⑤4}又说:“近士大夫侈言汉学,只是考证一事耳。考证固不可废,然安得与宋大儒所得者并论?世之君子,欲以该博取名,遂敢于轻蔑闽洛,此当今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也。”^{⑤5}但汉学中人则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⑤6},主张“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⑤7},而王昶更是“以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⑤8}。

其次,在对待专精与兼收的态度上,姚鼐认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⑤9}而汉学中人本以学贵专精为宗,认为“专力则精,杂学则粗”^{⑥0},“学贵精不贵博”^{⑥1},王昶也秉承此说,强调“杂则断不能精”^{⑥2},故对于“三者兼收”之说自不能引以为然。

最后,姚鼐“三者兼收”说的提出本是对当时汉学诸家贬抑义理、辞章的回应^{⑥3}。他曾一再批评“矜考据者之专心制度而不通理”^{⑥4}、“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⑥5},而乾嘉之际的汉学中人则认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主张“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以行于家国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⑥6}可见,对于治考据学者来说,三者本有层次上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袁枚与孙星衍在辞章、考据之辨时汉学中人的态度,姚鼐以“三者兼收”表彰“宗主汉学”的王昶,自难得其首肯。

正如章学诚所描述的,乾嘉之际治义理、辞章者均被汉学中人视为“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⑥7},即如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亦被认为“可传者不在此”^{⑥8},而姚鼐针对“宗郑毁朱”,“欲挽狂澜,执谗口”,自视能兼三者之作的《九经说》,更是“当先生存时,已无人重之者”。^{⑥9}因此,在考据学尚如日中天的乾嘉之际,兼及辞章之学的“三者兼收”说,自然

难以得到汉学中人的认可。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姚鼐对《述庵文钞序》所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重视,与王昶对该《序》的刊落,不仅反映了二人对义理、考据、辞章“兼收”的不同认识,也凸显了乾嘉之际汉学与宋学、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⑦

四、结语

姚鼐自四库馆辞归后,执教东南,多历年所,在谨守程、朱义理之学的同时,通过构建桐城文统,“以古文诗辞称重于世”^⑧,从学受业者日众。乾嘉之际,随着袁枚、孙星衍论争的传播南北,学坛热点由义理与考证之争转向辞章与考据之辨。是时,各方持论不一,或尊辞章而轻考据,或倡“通经明道”而贬抑义理、辞章,或以义理统摄考据、辞章。其中,面对汉学中人对辞章的轻视及对义理“空疏”的持续批评,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⑨,以之与宗汉学者相颉颃。嘉庆三年,王昶编就《述庵文钞》,由其子携至江宁,请旧友姚鼐为之作《序》,姚鼐遂于文中重申“三者兼收”之说,对王昶称许备至,期望得到这位汉学宗主的认可。然而,由于王昶对考据与义理、辞章的理解上与姚鼐存在较大的差异,最终将姚撰《述庵文钞序》刊落,而保留了赵怀玉的同名序文。对比两《序》的主旨,可见赵《序》重在强调治经须淹贯众说,视辞章为助考证之具,姚《序》则侧重阐发“必三者兼收之乃足为善”,从王昶对两篇《序》的存芟态度,也透视出乾嘉之际汉、宋学人对考据与辞章的不同看法。

而综合前文对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证,姚鼐撰写《述庵文钞序》的时间,应当在嘉庆三年五月以后,嘉庆三年八月或稍前,但至迟不会晚于嘉庆三年八月八日。

注释

①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六《复秦小岍书》,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1—62、104—105页。②姚莹:《东溟文集·外集》卷二《与吴岳卿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9页。③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辛亥七月”条,《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20页。④按,姚鼐关于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的文献,除《述庵文钞序》外,主要见于《惜抱轩文集》卷六《复秦小岍书》、《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一《尚书辨伪序》及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复林仲鸾书》。⑤⑬姚鼐:《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一《与姚春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6、165页。⑥关于《述庵文钞序》的写作时间,学界主要持两种观点:其一是乾

隆六十年,代表性的有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69—170页;周中明:《姚鼐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其二是嘉庆四年或稍前,代表性的有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17—318页。另外,尚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该序居于《礼笈序》《小学考序》之间,判断其大约作于嘉庆三年,但是这一判断忽略了同卷的《左笔泉时文序》居于二者之前,却是作于嘉庆五年者,而《敦拙堂诗集序》(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亦早于《海愚诗钞序》(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但排序时则居于其后,可见姚鼐的《文集》并非如其《诗集》是“依年编次”,如果仅是简单的依据《文集》顺序做判断似难令人信服。⑦姚鼐毕生著述丰赡,其诗文集现有刘季高整理的《惜抱轩诗文集》、卢坡校点的《惜抱轩尺牍》,因二书收录较为完备,是姚鼐及桐城派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本文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为《诗文集》《尺牍》所未收者。另外,笔者近日得卢坡先生惠赠《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一书(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在“续补”部分收入了本通书札,但尚未进行深入释证。⑧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八《姚鼐》,《续修四库全书》第16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⑨⑭⑯⑰⑱⑲⑳㉑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四《谢蕴山诗集序》、卷六《复秦小岍》、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六《复蒋松如书》、卷六《复秦小岍书》、卷四《谢蕴山诗集序》,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1、62、55、105、61、95—96、104—105、55页。⑩上海敬华拍卖股份有限公司编:《上海敬华2001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尺牍名人墨迹图录》(2001年12月14日),上海敬华拍卖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0522号拍品。⑪按:阮元称“后进才学之士执经请业,舟车错互,履满户外”(阮元撰:《擘经室集》二集卷三《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424页),由此可见王昶的学术取向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力。⑫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5页。⑬⑭⑮⑯⑰⑱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卷下,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4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8—90、100、105、96—97页。⑲⑳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三《王侍郎述庵文钞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0、550页。㉑关于《春融堂集》的版本及刊刻过程,可参见整理本《春融堂集·前言》,该文经比刊众本后认为,《春融堂集》现存最早的刊本当是嘉庆十二年本,即王昶逝世后翌年刊行本(王昶:《春融堂集》卷首《前言》,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2—17页)。㉒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1页;郑福照辑:《姚惜抱先生年谱》“嘉庆元年”条,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桐城姚浚昌刻本。㉓纽约苏富比有限公司2015年9月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2015年9月17日,第0520信札。<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50890520/>,检索日期:2018年7月6日。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3页。但该通书札落款为编者陈用光所刊落,所以首注以苏富比版本。㉔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东浦方伯书》,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5—106页;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页。㉕㉖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

出版社,2014 年,第 88—89、85、85 页。⑳郑福照辑:《姚惜抱先生年谱》“嘉庆三年”条,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桐城姚浚昌刻本。㉑姚鼐:《惜抱轩诗集》卷十《苏州新作唐杜公白公宋苏公祠于虎丘嘉庆戊午八月鼐及陈方伯诸公游宴祠内作四绝句》《戊午八月廿六日过苏州忽忽一诣虎丘后二十五日自杭州回与马雨耕及持衡重往竟日登揽因题八韵》,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612、616 页。㉒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与程戡园书》,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800 页。按,从孙星衍的答书来看,袁枚在致书时所表达的宗旨与《与程戡园书》基本一致。㉓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骈宇騫点校,中华书局,1996 年,第 91 页。㉔戴震:《戴震集·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92 页。㉕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 年,第 164—165 页。按,这场争论从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三年,余波则持续到嘉庆末年。㉖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焦循全集》第 12 册,刘建臻整理,广陵书社,2016 年,第 5890—5892 页。按,此札落款署“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即在乾隆六十年,可知是在读过孙星衍《问字堂集》后所作。㉗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与江豫来书》《答孙符如同年书》,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 年,第 212、216 页。㉘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99、644、105、784、684 页。㉙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4 年第 1 期。㉚陈用光:《太乙舟文集》,许隽超、王晓辉点校,蔡长林校订:《陈用光诗文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9 年,第 316、46 页。㉛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 年,第 171、188、177 页。㉜姚鼐:《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一《与姚春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5 页。按,据姚鼐致王昶书札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姚鼐虽然对他与王昶在学术主张上的差异有所了解,但自信对王昶“用意之深”处颇能领会,期望其所作《序》能得到采用,因此在《序》中强调“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并在书札中表达出“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的自

信。同时札中末言“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颇与《序》文中“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的深曲用意相契合,只是因姚鼐已自居“辞章”之林,所以强调对“经术”“名节”之说“此非鼐一人所当敬诵服膺,凡海内士流,其孰敢不承听乎”。㉝姚鼐:《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一《与姚春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6 页。按,此序中姚鼐提及“前年修《江宁府志》”,姚鼐受聘修《府志》之事,在嘉庆十六年,故本札当作于嘉庆十八年。㉞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赵怀玉》,钟哲整理,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4 页。㉟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年,第 463—469 页。㊱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复陈钟溪》,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74 页。㊲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一《与汪稼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8—19 页。㊳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92—393 页。㊴戴震:《戴震集·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214 页。㊵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王兰泉先生》,钟哲整理,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9 页。㊶姚鼐:《惜抱轩诗集后集》卷末《跋》,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646 页。按,此语为姚鼐从戴震处转述所得。㊷戴震:《戴震集》附录三《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489 页。㊸王昶孙:《惕甫未定藁》卷八《附答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4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374 页。㊹刘开:《孟涂文集》卷六《姬传先生八十寿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81 页。㊺段玉裁:《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戴东原集序》,钟敬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70 页。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钟哲整理,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8 页。㊼姚鼐:《伯山文集》卷八《书惜抱轩九经说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4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33、133 页。㊽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39—348 页;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 年,第 163—182 页。㊾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三《欧阳生文集序》,王澧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86 页。

责任编辑:王 轲

Yao Nai's "Shu'an Wenchao Xu" and the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Verification and Rhetoric"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Zhu Xilin

Abstract: Yao Nai, was a famous scholar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and one of the three ancesto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Shu'an Wenchao Xu", was an important text for Yao Nai to expound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principle, verification, and rhetoric". Due to the lack of primary sources, there had always been a major disagreement among scholars as to when this text was written.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new-found letters from Yao Nai to Wang Chang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related documents, it's safe to say that this text was written between May and August 8 of the 3th year of Jiaqing Reign. Furthermore, from Yao and Wang'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theory, we can perceive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different paths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verification and rhetoric"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Key words: Yao Nai; "Shu'an Wenchao Xu"; Wang Chang